

《史通》明蜀刻本考*

刘 占 召

内容摘要:《史通》传世最早版本,学界多误认为是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。事实上,该本的祖本——正德、嘉靖间的蜀本尚存世,洪业、王献唐各有四篇题记。陆深修订蜀本当是先在原板上剜改,后又改板翻刻。蜀本《因习》题目下注“缺文”,陆深抽出《鉴识》620字拼凑了假的《因习》。蜀本《补注》中仍保存《因习》755字,与张之象本文本相同。陆深又以《曲笔》491字窜入《鉴识》,这点可以张之象本正之。蜀本的再发现,证实《史通》传世版本的文本具有一致性。蜀本、陆本、陆本的翻刻本常被混淆,如张之象本校勘记所称之蜀本、顾广圻校订本所称之陆本,均为陆本的翻刻本。厘清蜀本、陆本与翻陆本不同的版本样态和递承关系,对《史通》文献校勘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:《史通》 蜀本 陆本 翻陆本 错简

刘知几《史通》系统总结了唐前史书的源流、体例和编纂经验,开创了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先河。该书在唐宋时期流传不广,文本讹夺、错简现象非常严重;亦无宋本传世,明嘉靖十四年(1535)的陆深刻本(下文简称“陆本”)被当作存世最早版本。1942年,蒙文通发表《馆藏明蜀刻本〈史通〉初校记》,认为“陆氏蜀刻本,亦最早之明刻本”,“况是蜀地旧槧,俨山所据,亦宋代蜀刻”^①。张振佩也曾主张“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《史通》版本,是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”^②。台湾学者庄万寿称陆本为新刊蜀本,“乃今所知《史

*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“探寻宋本:《史通》版本研究”(22FZW054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蒙文通著,蒙默编:《蒙文通全集》第2册,巴蜀书社,2015年,第505页。原载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《图书集刊》1942年3月创刊号。

② 刘知几著,张振佩笺注:《史通笺注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6页。该书修订本称:“现在可以见到《史通》最早版本乃蜀刻本,海内鲜见。”(中华书局,2022年,第7页)由于并未提及蜀本馆藏地,似未亲见。

通》明代最早的刊本”^①。近期出版的相关著作,依然沿袭这一看法^②。

其实,陆本的祖本——明蜀刻本(下文简称“蜀本”)尚存世。国家图书馆藏本仅存内篇十卷(索书号:18855);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(下文简称“台图”)藏本缺卷首刘知几《序录》(索书号:216.105177);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全本(索书号:SB/910;04/7282.4)。而陆本本身亦存在三种版本形态,即陆深剜改蜀本刻板的修订本、陆深改板重刻本及吴越地区的翻刻本(下文简称“翻陆本”)。蜀本、陆本、翻陆本并不相同,自明代以来学者多将其混淆,造成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。陆深是最早对《史通》进行文献整理的学者,他的整理工作便是修订蜀本,《史通》传世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,与陆深修订工作密切相关。只有参照蜀本,才能还原陆深文献整理的具体细节,并判断其对错;只有厘清蜀本、陆本不同的版本样态和环环相扣的递承关系,才能把《史通》各版本之间文本差异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。

一、蜀本为目前《史通》传世最早版本

蜀本的概念就是陆深明确提出的。其《题蜀本史通后》称:“深在史馆日,尝于同年崔君子钟家获见《史通》,写本讹误,当时苦于难读也。年力既往,善本未忘。嘉靖甲午之岁,参政江藩,时同乡王君舜典以左辖迁自川蜀,惠之刻本,读而终篇已,乃采为《会要》,颇亦恨蜀本之未尽善也。”^③陆深曾在崔子钟家见过写本《史通》,好友王舜典在嘉靖十三年又送他蜀本。陆深认为这两个版本都有很多讹误。嘉靖十四年,出任四川左布政使之后,陆深对《史通》进行了校正修订。

随着陆深修订本流行于世,蜀本湮没无闻。洪业、王献唐、郭立暄先后发现蜀本的存在,并做出精彩的鉴定。

洪业所见蜀本,即国图藏本,著录为明本。钤有“顾谦以牧今藏此书”“顾谦之印”“以牧氏”“倪粲之章”“棟亭曹氏藏书”“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”“清华侍从之臣”“洪业”“洪煨莲”等印章,经顾谦、倪粲、曹寅、富察昌龄、洪业等人递藏。书后有洪业弟子王钟翰在1980年所作的题记:“煨翁吾师藏有《史通》稀见之本三种:据师审定,一为明初蜀藩司刻本,仅存其上半

①庄万寿:《史通通论》,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2009年,第91页。

②白云译注:《史通》,中华书局,2014年,第13页。王嘉川解读:《史通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9年,第32页。《明本〈史通〉》,影印明万历五年(1577)张之象刻本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9年,第1页。

③刘知几:《史通》“后跋”,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(索书号:11312),叶一。下文所引陆本,均用此本。

部内篇十卷,精装四册,上有明季顾谦巽安捧日亭校记。师昔年自号无善本书室半通主人者,即缘此书之故。盖昔人所称曾见宋刻本者,恐皆是妄语,此蜀藩本殆为最早刻本。嘉靖年间,陆深所刻亦称蜀本者,即用此本翻刻者也。”^①洪业的鉴定意见不存,王钟翰的题记是对洪业观点的转述。

王钟翰提及“蜀藩本”和“蜀藩司刻本”两个术语,并将二者混用。其实蜀藩和蜀藩司是不同性质的概念,前者指蜀地藩王,后者是四川承宣布政使司。混用蜀藩、蜀藩司的,还有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,其卷五“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”条罗列蜀地藩王的刻书情况,有洪武二十七年的《自警编》九卷和刘向《说苑》二十卷、成化十五年的《静修先生文集》三十卷、嘉靖十四年的《史通》二十卷等。叶氏于《史通》下注:“见缪《续记》,即陆深刻本,云为蜀藩刻。”^②今按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卷四“校本《史通》二十卷”条:“《史通》,明嘉靖乙未,云间陆俨斋深为蜀藩,取旧本重校付梓,是明时第一刻。”^③缪荃孙、叶德辉显然不知道在陆本之前《史通》的明刻本还有蜀本。陆深担任四川左布政使,其衙署即蜀藩司,缪荃孙所言陆深“为蜀藩”,是蜀藩司的简称;而叶德辉在统计蜀地藩王刻书时将陆本罗列其中,显然是错误的。蜀本可能为蜀地藩王所刻^④,或可称为蜀藩刻本而非蜀藩司刻本。可能因为陆深曾在史馆担任编修,此前编纂过《史通会要》,所以蜀王朱让栩便把蜀本的旧板送给陆深,让他修订。

1937年,王献唐亦发现蜀本,即北大藏本。著录为明正德、嘉靖间四川刻本,内外篇俱存,是全本。王献唐有4篇题记(详见附录),据书中所钤“黄叶村庄”印和钱泰吉、辅宜二印,断定曾为吴孟举、钱泰吉所藏,而吴孟举的藏书又来自嘉兴高承埏及祁承燦澹生堂。王献唐称:“传世《史通》以明嘉靖陆俨山刻本著录为最早,次则万历张鼎思本、张之象本,又次则郭延年、王惟俭等《评释》本,类从陆书而更迭校正,历清黄叔琳至浦二田《通释》,殆集其

①刘知几:《史通》卷十,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、嘉靖间蜀藩刻本(索书号:18855),卷末附叶。下文所引蜀本,如未注明藏地,均为此本。

②叶德辉著:《书林清话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16页。

③缪荃孙著,张廷银、朱玉麟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目录编第1册,凤凰出版社,2013年,第237页。

④有学者认为南京图书馆所藏陆深刻本,“行款、刻书风格都与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让栩在成都所刻《栞城集》相似,两书时隔也只有六年,可见南图所藏《史通》本,是陆深在四川所刻”(毛俊仪:《略谈陆深蜀刻〈史通〉本鉴定》,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85年2期,第62页)。陆本在行款、刻书风格方面完全承袭蜀本(说详下文),则蜀本可能为蜀藩王朱让栩所刻。

成矣。万历两刻均与此本行字不合,合者惟陆本。陆本未见。据《明代版本图录》所载一叶,字体与《俨山集》同,与此不类。”王献唐所据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所收录的陆本书影^①,并不是真正的陆本,而是翻陆本(说详下文)。王氏以此断定陆本、蜀本字体不同,是错误的。王氏又云:“此本书体在正德、嘉靖间,纸墨颇粗,不似江浙,殆即嘉靖十三年前之蜀刻,讹误错简如故,其显易见者都未校正,知非陆氏重校本……此本与陆刻行字相符,错误皆未校正,书体又不合,既非陆本,亦非从陆翻刻之本。陆刻既出,更无再就讹误旧本重雕者,反复比验,谓为陆氏原据之蜀本,证其书体时次,正相当矣。”王氏以为此本纸墨颇粗、保留了陆本已改正的讹误错简,判定其为蜀本。王氏又谓:“世人但以陆刻当蜀本,不知其前更有蜀本。”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。

台图亦藏有蜀本,著录为明正德、嘉靖间蜀刻本,书中钤有“莫友芝图书印”“莫彝孙印”“莫绳孙印”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“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”“嘉业堂”等印章。缪荃孙鉴定云:“《史通》二十卷,明刻本。此书以陆俨山、张之象两刻为佳。此本尚旧,前、后序为劣贾所弃,不知何时刻耳。《曲笔》篇错入《鉴识》篇两叶,宋元本尚不如是。”^②未能确定此本的具体年代。郭立暄认为:“此书前后序跋为书坊撤去,刊书年月不可稽。观其字体,当是正、嘉间刻本。”“此初印本,未经俨山订正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二篇错简,卷五《因习》上第十八注‘缺文’,卷七《鉴识》末句‘扬名于后世者乎’接《探赜》,无陆深识语,或即俨山抚蜀时所见蜀中旧刻本。”^③郭氏以此书未经陆深校正而断定为蜀中旧刻,是对的。但蜀本书后原无序跋,故不存在“撤去”的问题。书前仅有刘知几《序录》,台图本除了书前《序录》散失之外,其他部分与北大本完全相同。

国图藏蜀本《曲笔》和《鉴识》两篇的文本语序非常错乱,其《曲笔》存365字和一处112字的空白,《鉴识》存1597字和4处空白(分别是25字、23字、39字、197字)。而其他两个蜀本《曲笔》存477字,《鉴识》存1485字。从表面看,似乎字数不同,文本次序亦有差异。其实,三个蜀本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两篇总字数是相同的,均为1962字,内容也完全相同。只是国图藏蜀本在某次修复时搞错了破损页面的次序,才造成文本差异的假象。国图藏蜀本破损严重,尤其是《曲笔》和《鉴识》。该书经过修复,即全书每一叶都加过

①潘承弼、顾廷龙纂: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,1971年,第346页。

②缪荃孙、吴昌绶、董康撰,吴格整理点校:《嘉业堂藏书志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84页。

③郭立暄:《中国古籍原刻翻刻初印后印研究》,中西书局,2015年,第285页。

衬纸,这是“金镶玉”的装帧形式——扫描件上,每叶的天头、地脚都有重影,这是原纸、衬纸大小不一,纸色不同留下的痕迹。《曲笔》和《鉴识》二篇的破损页面,修复时因不了解其正确的次序,故在装裱时被随机排列,造成文本错乱。正确的排序应是:《曲笔》叶六 A 面倒数第三行“至如朝廷”至“厚诬蜀老犹”(见图 1),有版心,位置不错,其上应接“多乌有”至“流汗刮席”(见图 2);《鉴识》叶七 A 面倒数第二行“割席不敢”至“绿林名”(见图 2),有版心,当上接“也逢孔宣”至“同年故知”;叶八 B 面首行“真观年”至“情伪可求”,有版心,当下接“膏肓墨守”至“罪褚生”;叶九 B 面首行“之含章”至第二行“妄施弹射矣”,有版心,当下接“夫史之曲笔”至“编之作盖”;叶十 A 面第二行“夫以废”至“扬名于”,有版心,当上接“由君懋”至“主人之甚乎”。经过上述次序的调整,国图藏蜀本不仅破损的纸张都能对接上(图 1、图 2 的拼接示意图 3),而且文本也与其他两个蜀本完全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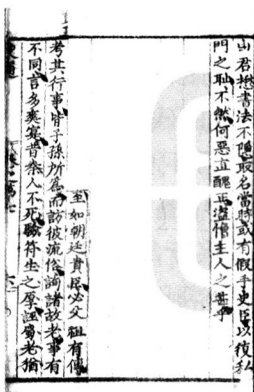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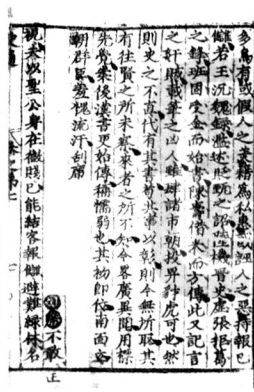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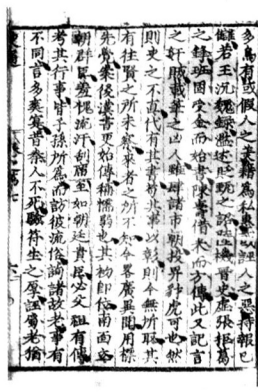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

另外,三个蜀本有大量相同的横向断板,如《六家》叶二 B 面“拟”“不”等 10 字、叶四 B 面“周”“公”等 4 字、叶五 A 面“也”“篇”等 6 字,《载言》叶三 B 面“膈”“相”等 5 字、叶四 A 面“传”“雄”等 5 字,《本纪》叶五 B 面“例”“厕”等 6 字,《世家》叶六 B 面“使”“氏”等 8 字,《称谓》叶十五 B 面“夫”“方”等 4 字、叶十六 A 面“事”“复”等 5 字,《模拟》叶五 A 面“闻”“王”等 10 字、B 面“作”“才”等 10 字,《书事》叶六 A 面“九”“五”等 8 字。上述 12 处断板完全相同^①,说明三个蜀本是用同一套刻板刷印的。

二、蜀本与陆深刻本的关系

蜀本经陆深修订后便湮没无闻,明清以来学者所关注的《史通》版本,多

^①蜀本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,以上举例均为开卷可见的明显断板,其他仅涉及个别字的断板还有一些,不赘举。

是陆本之后的版本。陆深对蜀本进行了哪些修订？这些修订工作是否可靠？如果没有蜀本作为参照，我们无从考究。蜀本的发现，不仅能还原陆深修订工作的具体细节，也能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版本问题。

首先，陆深修订蜀本的过程，是在原板剞改？还是改板翻刻？这是历来争论的第一个话题。陆深自述是在蜀本原板上剞改修订，其《题蜀本史通后》称“得因旧刻校之，补残刳缪，凡若干言”^①，即是剞改说的证据。而彭汝寔在陆本序言中却说陆深翻刻蜀本，“（陆深）左辖吾蜀，谓《史通》漫漶不可读，暇日节易而翻刻之”^②。陆深、彭汝寔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孰是孰非？洪业、王献唐主张陆深是改板翻刻，王献唐称：“陆跋，似就旧版校补，而订错简、还缺文，不能施于旧版，即云能之，蜀中旧刻书式何以竟与陆刻他书不谋而合。意陆氏入蜀，又就旧刻校定重刻一本，跋语稍含混耳。此本与陆刻行字相符，错误皆未校正，书体又不合，既非陆本，亦非从陆翻刻之本。”王氏认为陆深虽然自述为剞改，不过是含混之辞，旧版原有空间有限，不可能完成订错简、补缺文这类大量文本的剞改。殊不知陆深只在《因习》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作部分文本调整，配合以短跋加以说明，并不改动其他章节的格式；王氏认为蜀本、陆本字体不合，但他所依据的只是翻陆本的一页书影，其结论自然难以成立。洪业也考察过蜀本、陆本的关系，他用三个陆本（傅增湘藏本、翰文斋藏本、东方馆藏本）和蜀本进行比勘，最终的结论却自相矛盾，难以自圆其说。洪业考察的例子，是《史通》卷五《补注》篇“举一偶以三反”中“偶”字的字形。在国图藏蜀本卷五后，洪业写了四篇题记。其一云：“民国廿五年七月六至九日，洪业以陆深翻刻本（借自傅沅叔先生）较此本一至五卷，陆本行格与此本同。”其二云：“业按，卷五叶十上行十之‘偶’字，陆本作‘隅’，可见陆本刻时，乃以此本之曾经改者覆本上刻之也。”落款时间9/vii/36，即1936年7月9日。洪业最初将蜀本与傅增湘藏陆本对勘，二者行格、字体相同；蜀本“偶”字，有人改动成“隅”字，而傅增湘藏陆本既作“偶”又作“隅”，字形如隅^③，洪业便认为这是陆本覆刻蜀本的铁证。洪业后来又发现两种陆本，此处不是修改后的“隅”字，而是未经任何修改的“偶”字，他此前的推论便不攻自破了。在卷五后，洪业题记三云：“29/xii/36（1936年12月29日），业又按，东方馆藏陆本既作偶，而其叶上下二面尽同傅藏本，此又不可解。”其四云：“12/vii/39（1939年7月12日），业校翰文斋藏残陆本（仅存内篇全，外篇五卷十），亦作偶，然细看本中有字粗而模糊之板，有字细而清楚之板，此属清楚者也。殆因

①刘知几：《史通》“后跋”，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，叶一。

②刘知几：《史通》“后跋”，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，叶四。

③国家图书馆藏陆本同样如此。

板坏而补刻耳。”^①洪业在本卷叶十天头空白处又有校语云：“翰文本亦作偶，板较清楚。”“东方藏陆本作偶。”^②如果东方馆、翰文斋所藏陆本与傅藏陆本、蜀本“偶”字字形相似，洪业便能坐实陆本覆刻蜀本，但是东方馆、翰文斋藏陆本偏偏作“偶”字，而且没有任何改动，洪业只能以板坏补刻勉强搪塞。与洪业、王献唐不同，郭立暄认为：“陆本或系利用蜀藩刻旧版重修而成，并非另刻一本。旧版有残缺者，陆氏为之修补；旧本《曲笔》《鉴识》有错简，陆氏为之重修订正。”^③可惜，郭氏引而未发，并未做进一步的考察。

前人所见版本有限，不能一一坐实蜀本、陆本之间的中间环节。陆深修订蜀本的过程，是先在原板剜改，后又改板翻刻。南京图书馆所藏陆本（索书号：117559），便是陆深在蜀本原板上进行剜改的修订本。此书有黄丕烈跋，孙毓修校并录何焯、顾广圻校跋，钤有“百城堂记”“扫尘斋积书记”“礼培私印”“耕桑阁珍藏章”“天枢秘笈”“慎机珍藏”“孙毓修印”“小淶天藏书”等藏书印章，曾为王礼培、孙毓修等人收藏。上文考察的三个蜀本内篇的12处相同断板，南图藏陆本亦与之相同。另外，北大、台图所藏蜀本外篇的断板情况，亦与南图藏陆本相同，如《点烦》叶三A面“言”“公”等10字、B面“有”“死”等10字，叶四A面“望”“诏”等10字、B面“汉”“谬”等10字，《杂说上》叶三A面“以”“出”等10字、B面“彼”“有”等10字，叶五B面“货”“之”等10字，叶六A面“孟”“迁”等10字、B面“见”“亦”等10字，叶七A面“君”“亡”等10字，叶八A面“成”“幘”等10字，《暗惑》叶九B面“失”“不”等10字，《忤时》叶四A面“十”“也”等10字^④。要之，蜀本、南图藏陆本有大量相同的横向断板，均出自同一套刻板。但与蜀本相比，南图藏陆本又改正了一些文字，如蜀本《载文》“自江东而”，陆本改作“自江东西”；“土风之殊”，陆本改作“土风之殊”；“萧登”，陆本改作“萧督”；陆本重新改写、刊刻了《因习》《鉴识》两篇，增加了陆深、王阁、李佶、杨名、高公韶、彭汝寔等人的序跋。故南图藏陆本应是明正德嘉靖间蜀刻、嘉靖十四年陆深修板印本。

蜀本的刻板毁坏严重，除了有大量断板外，还有很多字模糊不清，如《世家》叶二A面有大段墨丁，《采撰》叶二A面、《书事》叶二B面、《疑古》叶二B面大段空白。鉴于蜀本的刻板损坏严重，难以继续使用，陆深在修板之后，

①刘知几：《史通》卷五，明正德、嘉靖间蜀藩刻本，叶十二。

②刘知几：《史通》卷五，明正德、嘉靖间蜀藩刻本，叶十。

③郭立暄：《中国古籍原刻翻刻初印后印研究》，第285页。

④为便于统计，以上举例仅选择断板处无空白的正文。即便如此，南图藏陆本中贯通书板的断板情况也明显多于国图藏蜀本，可知该本的刷印时间晚于国图藏蜀本无疑，这也符合陆深修改蜀本之书板在后的时间要求。

便按照修订本的面貌改板翻刻。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11312)、上海图书馆(索书号:790328-331)藏有这类陆本。上图陆本钤有“曾在云间啸园沈氏”“沈慈之印”“太常博士”“十峰父”“臣澄私印”“子清”“徐乃昌读”等印章,为沈慈、朱澄、徐乃昌等递藏。国图、上图所藏陆本,其板式、字体与南图藏陆本完全相同,只是没有断板痕迹,当是陆深按照修订本的面貌翻刻后的印本,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陆深刻本。要之,陆深所言“补残缺缪”,彭汝寔所言“节易而翻刻之”,都是事实。陆深先是在蜀本刻板上剗改,后又改板翻刻,这就是陆深刊刻《史通》的具体过程。

三、蜀本错简的真相及明清学者的争论

陆深修订蜀本的另一项工作是“定其错简,还其缺文”,即纠正《曲笔》《鉴识》错简,补足《因习》阙文。蜀本《曲笔》《鉴识》存在怎样的错简?蜀本《因习》是否真的亡佚?不参照蜀本而单靠陆本的跋文,有些细节无从查证。这是另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。

陆深的错简说见于陆本《因习》《鉴识》两篇篇后的跋文。《因习》篇后跋云:“按《史通》十卷,旧本定为三十八篇,篇系一事,惟《因习》分为上下篇,上篇旧称文缺。今本存三十七篇,比因订正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二篇错简,乃类为一篇以还之于此,未必其本书也,而文亦烦缀矣。”^①《史通》全书二十卷49篇,陆深此处特指内篇。蜀本《因习上》第十八题目下注“缺文”,《因习下》第十九题目下注“亦曰《邑里》”。陆深交代了补写《因习》第十八的文献来源,即错简文字。蜀本《曲笔》477字,《鉴识》1485字。两篇文字长短悬殊,的确存在错简的可能;经与蜀本比对得知,陆深所说的错简,是《因习》错入《鉴识》,《曲笔》亦错入《鉴识》。但他跋文中所云“订正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二篇错简”,实在容易让人误解。毛俊仪认为,陆深拼凑的《因习》篇,既有《曲笔》的错简文字,也有《鉴识》的错简文字:“陆本卷五《因习上》第十八整篇内容是陆深分别从卷七《曲笔》第二十五和《鉴识》第二十六两篇中订正而来,共计六小节,六百二十六字,‘古者诸侯并争胜负……至如朝廷贵臣必父……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至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耶’,共计三小节,我们在鉴定陆本时,又参照万历五年张之象校宋《史通》刻本,方知是从卷七《曲笔》第二十五中来,陆深搬来作《因习上》第十八的首段。用张之象刻本对照其中段和结尾,也可明显地看出,陆本的中段,即‘张晏云迁歿后亡……夫史之曲笔伪书不过一二至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’,共计三百九十七字,是陆深从卷七《鉴识》篇中挪用的,而陆本《因习上》第十八的后一段,即

^①刘知几:《史通》卷五,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,叶又十一。

‘陈氏国志……兹谤议者也’，是取于《曲笔》篇。”^①陆深在校订蜀本时，自称“惜无别本可参对”（《题蜀本史通后》），他只能依据文意对蜀本错简问题进行推测；陆深校订蜀本是在嘉靖十四年，当时张之象本尚未刊刻，我们只能对照蜀本，才能破解陆深错简说的真正含义。陆深拼凑的《因习》，正文共计 620 字^②，“古者诸侯”至“安可言于史耶”152 字，“张晏云”至“于拙目也”198 字，“夫史之曲笔”至“主人之甚乎”199 字，“陈氏国志”至“谤议者也”71 字，这四段文字均来自蜀本《鉴识》篇。可见，陆深拼凑《因习》的资料来源仅仅是蜀本的《鉴识》，陆深认为《鉴识》过长，这四段当是《因习》错简至《鉴识》的。不过，由于没有版本依据，陆深也坦言他所拼凑的《因习》未必符合刘知几的原意。

陆深认为蜀本《鉴识》篇幅过长，不仅窜入了《因习》，也窜入了《曲笔》，《因习》篇后的跋文解决了前者，《鉴识》篇后的跋文则解决《曲笔》文字窜入《鉴识》的问题。其云：“按《曲笔》篇‘流汗刮席’下便写‘至如朝廷’，止‘言多爽实’，凡三十七字，‘盖史之为用也’上绝不属《鉴识》篇。‘不可同年’下云‘故知割席不敢视’云云，‘割席’疑承‘刮席’为文。‘逮汉史继作’上亦不属其后，文多杂乱，难为章句，始知其为错简，因加订正如此。”^③这段话有两层意思：首先，《曲笔》“流汗刮席”下接“至如朝廷……言多爽实”37 字，其后至“盖史之为用也”，中间有 32 字（即“昔秦人不死，验符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”），陆深认为这 32 字不在《鉴识》，当在《曲笔》。此 32 字本来就属于蜀本的《曲笔》，陆深这么讲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这其实是为解释下一段话做铺垫，因为这句话中的“厚诬”“多枉”最符合《曲笔》文意，陆深这是为下文立论确定依据。其次，《鉴识》篇“不可同年”下接“故知割席不敢视”，陆深可能发现“割席不敢视”与上下文意不连贯，应该不是《鉴识》文字；而“割席”可能是《曲笔》篇“刮席”的误刻，割、刮形近易讹，则《鉴识》篇“割席”至“逮汉史继作”之间 441 字应该置于《曲笔》篇“刮席”之下。

那么，陆深的蜀本错简说是否符合实际？这可以参照张之象本和卢文弨《史通校正》所据之底本，这二者都来自于宋本。张之象称：“梁溪友人秦中翰汝立视予家藏宋刻本，字整句畅，大胜蜀刻。”^④卢文弨《史通校正》序称其校勘底本是“华亭朱氏影钞宋本”^⑤。卢校《因习》底本文字有“不呼其上

①毛俊仪：《略谈陆深蜀刻〈史通〉本鉴定》，第 63 页。

②毛氏统计为 626 字，可能包括题目“《因习上》第十八”六字。

③刘知几：《史通》卷七，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，叶十。

④《明本〈史通〉》，第 8 页。

⑤卢文弨校补：《群书拾补初编》第 4 册，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徐姚卢文弨抱经堂刻本（索书号：目 15 845），叶一。

曰周王、载于高氏传、刘隗称其议狱事具刑法志、寻班马之为列传、列姓名于卷中而又于列传之下、是则邓禹寇恂之首、当标为将师者矣、则不异诸华、仍成夷夏之隔、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、告诸往而知诸来”,其《曲笔》底本文字有“人伦所同嫉也、苟其事已彰、称之懦弱也、已能结客报仇、或明皇所定、此事从何而书之、逮乎近古、国自称为我长、难为妄说、安可言于史耶、言多爽实、呜呼”,其《鉴识》底本文字有“渊浩广博、焉足以辩其利害、论才则同耻、逮史汉继作、又劣固而优迁、递闻得失、其言为鄙、历说诸家晋史、沦溺空华、其事该、必令同文举之含异、夫史之曲笔芜书、不过一二、语其罪负为失已多、固已知仓颉已降、七经之冠冕也、既而梅氏写献、乃老经撰于周日”,卢校底本文字与张之象本基本相同、语序完全一致,可见在宋本中《因习》《曲笔》《鉴识》的文本是一致的。

我们先看陆深所言的第一处错简,即从《鉴识》抽取 620 字拼凑《因习》,由于《鉴识》被抽取四段文字后支离破碎,陆深便重新刊刻一篇新的《鉴识》,但他又保留了蜀本原板中《鉴识》的题目和两行原文,也就是说,陆本有两个《鉴识》的题目,这或许是为了提醒读者《鉴识》是被修订过的。比照张之象本和卢校底本,陆深拼凑的《因习》完全对不上,而且原本属于《鉴识》的文字(“张晏云”下 198 字、“夫史之曲笔”下 199 字)被错误挪走;另外还可以发现,蜀本《因习》并未全部亡佚,而是有 755 字保留在上篇《补注》的篇尾。蜀本这 755 字和张之象本、卢校底本的《因习》完全吻合,仅有 7 字之别。蜀本亡佚的仅仅是《因习》的题目和篇首 364 字。陆深所言蜀本的另一处错简,即《曲笔》窜入《鉴识》者一段 441 字,经张之象本验证完全正确。乙正后,蜀本《曲笔》918 字,《鉴识》1044 字,篇幅大致相当。《因习》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三篇的文本,蜀本与张之象本是大体相同的;陆深修订蜀本时,制造了假的《因习》,割裂了《鉴识》的文本(陆深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能作出部分正确的调整,说明他的判断力已是非常高超的),造成陆本、张之象本文本的差异。

更有甚者,黄叔琳、卢文弨误读陆深的错简说,进一步加大了《史通》版本的文本差异。卢文弨在《曲笔》“安可言于史耶”下有校记云:“此下有一百九十九字脱,在《鉴识》篇中。自‘夫史之曲笔诬书’起,至‘盗憎主人之甚乎’止,陆俨山校本在此下,何义门亦谓当在此。”^①卢文弨认为华亭朱氏影抄宋本的《曲笔》有 199 字的脱文窜入了《鉴识》,并称这是陆深的意见。陆深确实认为此段是错简,但不是《曲笔》而是《因习》窜入的,所以陆深将这段文字置于陆本的《因习》。此说也见于黄叔琳《史通训故补》:“陆俨山校本‘夫史之曲笔’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《曲笔》篇‘安可言于史耶’之下,依检宋本

^①卢文弨校补:《群书拾补初编》第 4 册,叶十二。

仍在此篇(《鉴识》)。”^①卢文弨的意见或转引自黄叔琳,其在《史通校正》序言中提到:“近时北平黄昆圃少宰又为之补板,行于世,洵称善本矣。”^②卢文弨又说何焯亦持此论,何焯的意见来自于冯舒阅本和明代郭孔延的《史通评释》。何焯在张之象本《鉴识》后有两篇题记:“蜀本第五卷、第七卷皆有错误,此本于第五卷已刊正,惟此《曲笔》篇中十一行误在《鉴识》篇中,赖得冯氏阅本正之。”何焯所言“十一行误”即是此199字。何焯又称:“后见万历中郭氏刊本,已正其违错,书固须遍观也。”^③可见,蜀本《鉴识》中“曲笔诬书”至“盗憎主人”199字,陆深认为是《因习》窜入的文字,郭孔延认为是《曲笔》窜入的文字,黄叔琳、卢文弨误把郭孔延的意见当作陆深的意见。

顾广圻则反对此199字为错简,嘉庆九年(1804)九月,顾广圻在翻陆本《鉴识》的天头题记云:“不当入《曲笔》,李百药以魏收为实录,魏征以王劼为有惭正直,皆子玄所摘《鉴识》之谬者耳。若《曲笔》者载事而失其实,《鉴识》者评史而乖其理,二篇之别在此。”^④顾氏认为此199字的语意更符合《鉴识》主旨,所以不是错简。道光三年(1823),顾广圻看到张之象本以及何焯的题记,便在何焯题记之后也写了一篇题记:“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二篇并无错简,冯氏阅本、万历所刻皆误,而何氏跋语尚失之。颜黄门云校定书籍亦胡容易!洵然。”^⑤顾氏十年前的校勘意见是根据语意的理校,此时找到张之象本作为版本依据,便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。

四、明清学者对陆本、翻陆本的混淆

陆深在四川刊刻《史通》之后,在吴越地区又有陆深刻本的翻刻本。上海图书馆藏顾广圻校订本便是翻陆本(索书号:T01244-47)。此本有顾广圻手书校跋,又有邓邦述、叶景葵、洪业、顾廷龙等人的跋,封面有邓邦述“百靖楼”“群碧楼”“嘉靖刻本”“校本”组合印,书内钤有“顾广圻印”和邓氏“正閤居士”“正閤审定”的印章。顾广圻、邓邦述、叶景葵认为此是陆深刻本,潘景郑、顾廷龙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沿用此说,王献唐便据此误以为是陆本。翻陆本和陆本一样,也是半叶十行行二十字,书的前后亦有陆深、杨名、王阁、李佶、彭汝寔、高公韶等人序跋。翻陆本明显的改动有,首卷卷端的“内篇”

①黄叔琳:《史通训故补》,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二年(1747)黄氏素养堂刻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516页。

②卢文弨校补:《群书拾补初编》第4册,叶一。

③《明本〈史通〉》,第204页。

④张振佩笺注:《史通笺注(修订本)》,第350页。

⑤《明本〈史通〉》,第204页。

下增“唐刘子玄知几撰”；《鉴识》篇，翻陆本将陆本挪到《因习》的620字全部还原，并删去篇后陆深的跋文；陆本保留的蜀本《鉴识》篇题目和篇首前40字，翻陆本亦将其删除；蜀本、陆本为颜体字，翻陆本为仿宋字。

明清学者常将翻陆本误作蜀本、陆本，这给后世研究带来诸多混淆。顾广圻在上图藏翻陆本卷五后题记：“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云‘陆文裕公刻蜀本《史通》，其《补注》《因习》《曲笔》《鉴识》四篇残脱疑误，不可复读，文裕题其篇末而无从是正，举世罕睹全书’云云，即此本也。”^①《补注》等四篇残脱疑误的问题，陆本、翻陆本都存在，且二者书前书后的序跋相同，故而顾氏误将此本当作陆本。洪业在书末有跋文云：“其字体乃与昔所见原梓、翻修陆刻诸本迥不相同。似吴越，不似川蜀工手。”“盖《鉴识》篇后陆跋已删削去，《因习》上篇后陆跋虽存，而篇中所聚错简，乃皆已见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二篇中，自与跋语相抵牾也。是不仅刻工字体一端可断其非陆氏蜀刻矣。涧菴题识遽从遵王《敏求记》所述，以文裕刻本相当，殆未细读《因习》篇后跋文，而竟为书前后之序跋所欺耳。”^②洪业敏锐地发现翻陆本与陆本在字体、文本上的区别，并鉴定此本为吴越地区翻刻本，这是非常精审的^③。洪业进而怀疑翻陆本“乃《天一阁书目》中范尧卿所谓第三刻本之流”，这一推测是非常中肯的。天一阁所藏《史通》有范钦跋称：“《史通》先刻于蜀，最称讹缪。陆文裕辄以己意更定，犹未了了。后人更校刻之……是本盖第三刻者。”^④范钦跋文称万历四年（1576）二月，他以此本做过校勘，而此时的明刻本除了蜀本、陆本，只有翻陆本，则范钦所言第三刻当为翻陆本，言外之意即以蜀本为明代第一刻、陆本为第二刻。范钦还指出翻陆本把蜀本、陆本中保留的唐宋习惯写法改成了明代通行的文字，如“万”之为“萬”、“号”之为“號”、“卒”之为“卒”，这可以在翻陆本中得到验证。洪业又称万历五年张之象刻本校勘记中的蜀本可能是翻陆本：“昔者业校万历丁丑张碧山云间刻本所注蜀本异文，讶其辄与蜀藩原刻及俨山翻梓诸本不同，疑碧山亦为第三刻本之流所

①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：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227页。

②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：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》，第228-229页。

③洪业提到陆本的《曲笔》《鉴识》删除了用于拼凑《因习》的错简内容，翻陆本的《曲笔》《鉴识》又将这些错简文字重新还原，而实际情况是翻刻本将陆深拼凑《因习》的文字全部还原在《鉴识》。洪业也误解了陆深的错简说，误以为《因习》是抽取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两篇的错简文字拼凑而成，而其实仅来自于《鉴识》，上文已述。

④转引自范邦甸：《天一阁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19页。

愚。”^①洪业曾收藏过国图藏蜀本,研究过三种陆本(傅增湘藏本、翰文斋藏本、东方馆藏本),这一推测是正确的。张之象本有蜀本校勘记16条,其中有两不见于蜀本和陆本,而仅见于翻陆本:《补注》篇“难以披览”,张之象本校勘记“蜀本作搜”,而蜀本、陆本均作“披”,翻陆本作“搜”;《人物》篇“有贤不肖”,张之象本校勘记“蜀本不肖上有一有字”,而蜀本、陆本均无“有”字,翻陆本作“有不肖”,可见张之象所据蜀本,确为翻陆本。张之象所据的翻陆本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(索书号:1880),仅存卷十一至十三、十九至二十,误著录为明嘉靖间陆深刻本^②。书中钤有“张氏玄超”“虞山沈氏希任斋劫馀”“曾在沈芳圃家”等印,为张之象、沈养孙、沈芳圃递藏。书中有浮签:“此即张之象万历五年重刻陆深本《史通》时之底本,书中校语即出自张氏手。所钤张玄超印,玄超乃之象字。此本发现,实版本学中一奇迹,堪称人间瑰宝。”张之象将翻陆本误作蜀本,顾广圻将翻陆本误作陆本。对此,洪业感慨云:“然则润蕢错认在乾嘉之代,碧山错认于万历之初,更在其先二百馀年也。诸家目录校记沿张、顾之误者指不胜数,毋论矣。”^③另外,北大图书馆亦藏有翻陆本(索书号:LSB/4358),著录为明嘉靖间刻本。

比对蜀本、陆本、翻陆本,其文本变化的轨迹是清晰可辨的。蜀本《古今正史》“张勃撰《吴录》异文出”,南图陆本将“出”字剗改作“错出”二字,此处只有一个字的空间,所以作左右并列的两个小字,国图陆本保留这一原貌,而翻陆本“错出”二字则占上下两字空间。张之象本作“异文间出”,其校记云“蜀本作错”,实与陆本、翻陆本同。相同的情况,如蜀本《杂说上》“陛下所在积数年矣”,南图陆本把“积”字剗改作“积有”二字,因只有一个字的空间,所以作左右并列的两个小字,国图陆本保留这一原貌,翻陆本“积有”二字作上下排列的大字。张之象本作“积数年矣”,其校记“蜀本积下有有字”,而真正的蜀本无“有”字,张之象本亦是据翻陆本而来。

五、结语

《史通》的版本,朱希祖划分为宋本系和嘉靖本系两类。所谓的宋本系,即张之象刻本;所谓的嘉靖本系,即陆深刻本^④。傅振伦《〈史通〉版本源流

①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》,第229页。

②已被鉴定为翻陆本(曹鑫《上海图书馆藏〈史通〉明刻本述略——以张之象刻本系统为中心》,《图书情报工作网刊》2012年9期,第48页)。

③陈先行、郭立暄编著: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》,第229页。

④《朱希祖书信集》1922年3月14日朱希祖致张元济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16页。

考》亦有此说^①。《史通》两大版本系统,主要区别是《因习》《曲笔》《鉴识》的文本差异。蜀本的发现,为我们找到了嘉靖系版本的源头,揭示出文本差异的症结所在——陆深割裂蜀本《鉴识》以拼凑《因习》,制造了一篇假的《因习》,另一方面也使得《鉴识》因缺少文字而支离破碎。蜀本的《因习》仅亡佚了题目和篇首 364 字,其在《补注》中保存的 755 字,与属于宋本系统的张之象本吻合。陆深乙正了《曲笔》窜入《鉴识》的 441 字,这样嘉靖本系的《曲笔》《鉴识》与张之象本完全相同。可见,《史通》的传世文本,不论宋本系还是嘉靖本系,其文本高度一致。蜀本提供了陆本之前的《史通》面貌,有助于还原陆深文献整理的具体细节;陆深先在蜀本刻板上剗改,继而改板翻刻,其刻本又被吴越地区翻刻,《史通》开始从四川流布四方。王阁为陆深撰写的《刊正史通序》中称:“然人虽得而葆之,不免蒙翳之患,舛讹烦乱,龃齬惟艰,脱简缺文,坐令荒惑,不有先觉,将为聚饮之书也。”^②陆深开创了《史通》研究的新局面,此后《史通》的刊刻、注解、评点蔚成风气,乃至成为明清学术的显学。如今陆深的文集已被整理出版,他在《史通》研究史上的学术贡献,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。

附录:北大藏蜀本中的王献唐佚跋四篇

石门吴之振孟举辑刻《宋诗钞》,收藏多秘本,见《池北偶谈》。书类得于携李高氏及祁氏澹生堂,见黄氏太冲《天一阁藏书记》、全谢山《小山堂祁氏遗书记》。藏书处名黄叶村庄,著有《黄叶村庄诗文集》,见《嘉兴府志》及《曝书杂记》。迨后散出。钱警石《甘泉乡人稿·藏书述》云:“岁丁卯,世父得语溪吴氏黄叶村庄藏书,尽举以赐。”知又泰半归钱氏。今此明本《史通》有“黄叶村庄”印,又有“钱泰吉”及“辅宜”二印,正即吴氏转归钱氏之书。一昨,书友以明槧书数种求售。世变日亟,无意事此。念僻处郊外,远涉六七里路而来,姑循其意,收此一种。越日晨起,记藏书原委如右。三十七年四月廿七日献唐沛上书。(钤“献唐”印)吴氏藏书印又有“延陵季子”,朱记,见天禄琳琅《唐人万首绝句》明刊本。

《唐书·刘知几传》:撰《史通》内外四十九篇,今本目列五十二篇,缺三篇,余篇与刘传合,知北宋修《唐书》时已亡三篇。幸存其目耳。此本目缺。《自序》篇,书中有之,合以目后题语,编次颇失伦序。所缺《体统》《纪繆》《弛张》三篇,各本皆在《自序》目后,非是。《山堂考索》以《纪繆》缀《烦省》篇下,余未及知,所见另为一本,今不传矣。次日再记。(钤“五砚主人”印)

^①傅振伦:《〈史通〉版本源流考》,《图书馆》1962年第2期,第48-50页。

^②刘知几:《史通》第1册,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,叶三。

传世《史通》以明嘉靖陆俨山刻本著录为最早,次则万历张鼎思本、张之象本,又次则郭延年、王惟俭等《评释》本,类从陆书而更迭校正,历清黄叔琳至浦二田《通释》,殆集其成矣。万历两刻均与此本行字不合,合者惟陆本。陆本未见。据《明代版本图录》所载一叶,字体与《俨山集》同,与此不类。前后又无序记可稽,但就陆跋求之,尚有鳃理可寻也。跋谓:嘉靖甲午之岁,同乡王君舜典以左辖迁自川蜀,惠之刻本,读而终篇已,乃采为《会要》,颇亦恨蜀本之未尽善。明年乙未,承乏西来,得旧刻校之,补残刊缪,凡若干言,又订其错简,还其缺文,于是《史通》始可读云。陆跋在嘉靖十五年,其见蜀本在十三年甲午,雕版当在十三年前。此本书体在正德、嘉靖间,纸墨颇粗,不似江浙,殆即嘉靖十三年前之蜀刻,讹误错简如故,其显易见者都未校正,知非陆氏重校本。陆跋,似就旧版校补,而订错简、还缺文,不能施于旧版,即云能之,蜀中旧刻书式何以竟与陆刻他书不谋而合。意陆氏入蜀,又就旧刻校定重刻一本,跋语稍含混耳。此本与陆刻行字相符,错误皆未校正,书体又不合,既非陆本,亦非从陆翻刻之本。陆刻既出,更无再就讹误旧本重雕者,反复比验,谓为陆氏原据之蜀本,证其书体时次,正相当矣。自陆本问世,至浦氏《通释》,皆由此刻一校再校,大致虽还旧观,而先后嬗变之迹,非溯原是本不可见。昔黄尧圃跋嘉靖本《史通》,谓书友言外间买书者唯《史通通释》是问,若此刻则无过而问者,故以归子云云。余收此书,殆与尧圃同酸咸矣。是年五月二十六日。(钤“王献唐”印)

顷检阅涵芬楼印张鼎思本。张出于陆,附陆本各跋,有汉嘉彭汝寔跋云:俨山陆先生子渊左辖吾蜀,谓《史通》漫漶,暇日取节易而翻刻之。是明言以蜀旧本翻刻,非以原版校订重印也。卷七《鉴识》篇下刻陆氏识语,此本无之,更知非从陆本翻出,且非陆本。蜀有旧刻,陆由翻雕,世人但以陆刻当蜀本,不知其前更有蜀本。以彭跋漫漶语证之,陆翻之时,原版雕刻已久。说以正德,当非无据。惟前后无题识,不知刊于何年何人,为可恨耳。张之象本谓曾得宋刻,卢抱经《群书拾补》亦据宋本校之。宋本缺外篇目录,卢云张刻有之,非是。两本当有异。今皆莫见。但就此蜀刻内容及先后诸家勘校之勤,知宋槧与明代各抄亦皆非善本。《玉海》所引《史通》,时有讹字脱文,可见也。六月二十四日平乐印庐记。(钤“献唐题记”印)

本文写作过程中,杜泽逊、姚文昌、隗茂杰、王振华、孔妍文众师友提供各种帮助;匿名评审专家提出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。特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刘占召,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唐代文学与文献。